



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写
“阿Q正传”

徐嘉瑞等著

雲南人民出版社

魯迅先生爲什麼要寫“阿Q正傳”？



魯迅先生爲什麼要寫“阿Q正傳”？

*

著 者：徐嘉瑞等

出版者：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書林街 100 號）

印刷者：雲南人民印刷廠 發行者：新華書店雲南分店

*

1957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數：37,000

開本：787X1092 $\frac{1}{32}$ 印張：2 印數：1—1,582

（雲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新字第0011號）

統一書號：10116·78

定 價：(7)一角九分

出版者的話

爲了紀念我國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學家魯迅先生，並有助於青年讀者進一步認識和學習魯迅先生，特彙集了八篇文章出版。

這些文章，有的闡述了學習魯迅，反對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現實意義；有的分別研究、分析了魯迅先生的幾篇重要小說，對我們理解和研究魯迅先生的作品有所啓發；有的文章則可以使我們更能體會魯迅先生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的精神和他對青年人的愛護和培養。

雲南人民出版社

1957.1.1

目 錄

- 魯迅先生爲什麼要寫“阿Q正傳”？……徐嘉瑞（1）
- 魯迅在“阿Q正傳”裏如何批判辛亥革命？……
……劉堯民（9）
- 魯迅小說中的婦女羣象……蒙樹宏（17）
- 學習魯迅，反對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
——在昆明市魯迅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會上的發言……李廣田（33）
- 我對魯迅先生的認識
——在昆明市魯迅逝世二十週年紀念會上的發言……吳祖光（45）
- 青年向魯迅學習些什麼？……陸萬美（50）
- 從阿Q精神到空頭文學家……魯 凝（53）
- 魯迅是培養新生力量的典範……洛 汀（58）

封面設計：笳聲、賀惠賢

魯迅先生爲什麼要寫“阿Q正傳”？

徐嘉瑞

當魯迅先生寫“阿Q正傳”的時候（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正是十月革命後四年，五四運動後二年，正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全國各地中國共產黨小組成立（一九一九年）後二年，正是毛澤東同志在湖南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〇年）後一年，正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那一年（一九二一年），這是中國革命的大轉型期。魯迅先生在那時，是受到這時期的影響的。我們看，在一九一八年他寫的一篇短論“生命之路”中說：“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跳着，笑着，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人類總不會寂寞，因爲生命是進步的。”這顯然是受了共產黨小組李大釗同志等人的影響的。

研究“阿Q正傳”，首先要談一談“故鄉”，因爲“故鄉”是在寫“阿Q正傳”的前一年（一九二〇年）寫的。從這一篇小說中，不但可以看到從魯迅眼中所看見的農民的痛苦，農村破產的景象，並且可以了解這一時期魯迅思想的活動，以及他對農民的分析和對革命出路的看法等等。

在那時，他已經看見一條新的道路，在“故鄉”中，表示出來的雖然不很明白，但方向是已經確定了的。他這時所看見的是革命的道路，是“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道路；他所遵奉的命令，“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

“那就是後來結集起來的‘吶喊’”。（“自選集序”）

足見“吶喊”中的小說，包括“阿Q正傳”在內，都已經開始有了一個方向，不是幻滅，不是空虛，而是遵循着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

究竟這革命的前驅者是哪一些人呢？即是共產黨小組，即是共產主義者代表人物之一——李大釗同志。怎麼來證明呢？用魯迅自己的話來證明，他在“守常文集序”中說：“但革命的先驅者的血，現在已經並不希奇了。”“不過熱血之外，守常先生還有遺文在。”“他的遺文都將永在，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由此看來，他寫“吶喊”中的小說時，所遵循的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指的是已經犧牲了的共產黨員李大釗同志和共產黨小組的宣傳了。

雖然在寫“阿Q正傳”的時候，他還是在進化論思想的階段上，但他受共產黨的革命理論的影響，是不能否認的。

回過頭來，再從“故鄉”說起。魯迅寫“故鄉”比寫“阿Q正傳”早一年。無疑的，在這一年中，對他醞釀阿Q的性格，起着絕大的作用。在“故鄉”中所表現的潤土，是農村中比較普遍的典型，他勞動，他誠實，他胆小，麻木，還有自私軟弱等等。魯迅同情潤土貧窮飢餓的生活，受官紳兵匪壓迫剝削的生活，反對他胆小麻木和軟弱得“象木偶一樣的生活”。更反對“恣睢”的，欺軟怕硬的，但同時也是奴隸的生活，這三點即是：（一）勞動窮苦，（二）胆小麻木，（三）恣睢，可以看作魯迅寫“阿Q正傳”以前對農村生活和農民性格的理解、分析，也即是說在封建統治者

壓迫剝削和毒害下所形成的阿Q性格的雛形。爲什麼不用潤土作爲農民的典型呢？因爲潤土還缺少兩樣東西：第一是“恣睢”，因爲他只是胆小害怕，而不欺軟怕硬；第二是缺少消極反抗（精神勝利）的精神。因此，潤土的性格在農村中雖然普遍，却不突出，雖然安分守己，但不能代表一些消極反抗的人物。阿Q的性格，能包括潤土和潤土以外的一些具有消極反抗情緒的農民性格，不只如此，阿Q還能代表農民以外的若干階層，即統治階層中從皇帝起直到趙太爺、假洋鬼子及沒落的知識階層的“恣睢”的、欺軟怕硬的、無恥投降的精神。

在“故鄉”中，魯迅已經看見有一條新的道路：“眼前展開一片海邊碧綠的沙地來，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他說：“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鄉”）這條路是“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熱風”：“生命的路”）當然，希望不是馬上就能實現，但是他堅決的相信，在宏兒和水生們一代，一定會有“新的生活，爲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果然，魯迅的兒子海嬰如今已經和潤土的孫子（水生的兒子）章張貴在魯迅的故鄉攜手遊玩了，這是魯迅先生早已相信一定會來到的新的生活。

魯迅先生憎恨的是奴隸思想，做外國人的奴隸，做地主階級的奴隸，奴隸的奴隸，奴隸還欺負奴隸。他主張生存，反對苟活；要想生存，就得戰鬥，卑怯就要死亡。“不爭之民，其遭遇戰事，常較好爭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荅落殲亡，亦視強項敢死之民衆。”（“墳”：“摩羅詩力說”）

他主張活動，只要能活動，就有缺點，有錯誤，也不要緊；只要動起來，總比半死不活的好。他說：“我以爲人類爲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華蓋集”：“北京通訊”）這篇文章寫於一九二五年五月，我想是可以引來說明“阿Q正傳”的。

阿Q並不是永遠不變的，而是有發展的，在阿Q的生活中，有他的醜惡的一面——精神勝利，但也有他的活動的一面，這是魯迅先生看做最可寶貴的一面。雖然阿Q對革命沒有正確的認識，只是想“元寶洋錢”，只是想“鄒七嫂的女兒”和“吳媽”，只是想往上爬，欺負小D和小尼姑，這些固然是缺點，是錯誤，但是他對趙太爺的憎恨，對假洋鬼子的蔑視，還想着拿起板刀、鋼鞭、炸彈、洋砲，一同去革命，這些不能不說是活動的發展的革命萌芽，這在當時死氣沉沉的農村中，還是寶貴的東西。可恨的是，他沒有把這種精神發展爲堅強的戰鬥，還是用老辦法——精神勝利去對付兇狠的敵人，結果死在敵人手中。魯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正因爲他看到只有鬥爭，才有前途，才有光明。

魯迅先生暴露了中國農村的黑暗破產和殘酷的剝削（從香燭到尿布），“至於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象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集外集”：“俄譯阿Q正傳序”）革命是非起來不可的了，他又暴露農民的“麻木無知”，“偷安苟活”，“精神勝利”，阻礙了革命的道路，但是他所暴露的只是一部分人，而不是全體的中國人，若果說失掉自信力以及自欺欺人的性格是全

體中國人民的性格，這不是他的意思，他說：“中國人現在是發展着“自欺力”。“更長久的麻醉着自己。”然而“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說中國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則可，倘若加於全體，那簡直是誣蔑。”（見“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嗎”）這一篇文章，寫於一九三四年，雖然在寫“阿Q正傳”之後十多年，但他對中國人民“國民性”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阿Q精神是中國人的瘡疤，不能把瘡疤就當做人，不能把阿Q的瘡疤代表中國全體的農民，而只是一部分的人感染了毒瘡，這毒瘡是從宮廷、都市、地主家庭、秀才世第傳染到農村中來的。這毒瘡在統治者身上，是不可醫治的。因為統治者本身就是毒瘡，只有經過革命把它們挖掉，而在農民身上的毒瘡，却又不同，他們一經覺醒，知道是瘡，這瘡就能醫治，但也需要指出他們身上的毒瘡，他們才會覺醒。

革命是一定要來的，阿Q是一定要做革命黨的，壓力越強，革命就越來得快，“俄國的革命，不就是從這樣的路徑出發的麼？”（“華蓋集”：“北京通訊”）

中國一定要革命，因為壓力越來越大，更因為“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還有“先驅者的血”，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並且這些人占大部分，因此阿Q也就不是永遠不變的。生活是在不斷的變化，發展，在生活中，永遠有新的和舊的鬥爭，新生的和衰亡的鬥爭；魯迅先生在阿Q身上發現了這一點新的東西、新的萌芽，抓住

它，批判它舊的一面，促進它新生的一面：阿Q 他會變化，會發展，他會做革命黨，這是他的階級性。但當他還未覺醒時，他是一個阿Q，他真正地覺醒了，他就會發展成爲一個真正的革命黨，是另一個阿Q了。這是阿Q 性格中矛盾對立面的發展，這是從小到大，從星星之火燃燒起來的，哪怕它只是一點嫩芽，那樣軟弱，那樣無力，只要他活動，只要他丟棄了可恥的精神勝利，想拿起板刀、鋼鞭去革命，那麼“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了，這是阿Q 性格變化發展的必然性，也即是中國農村變化發展的必然性。農村在窮困，在死亡，在動盪，在變化，沉默的中國人民，會打破高牆，“會自己覺醒，走出，都來開口的罷。”（“俄譯阿Q 正傳序”）果然，不久（一九二六年），湖南農民起義的大浪潮就來了。這是一個人物性格的對立面的鬥爭，也是中國農村生活對立面的鬥爭，因此，魯迅先生說：“中國倘不革命，阿Q 便不做，既然革命，便會做的。”“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華蓋集續編”：“阿Q 正傳的成因”）

辛亥革命已經失敗了，過去了，那麼一九二一年的魯迅還寫阿Q 正傳做什麼呢？他說：“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踪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 似的革命黨出現……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阿Q 正傳的成因”）一九二一年，是五四運動以後革命發展的重要的一年，在五四以前，共產主義者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大釗同志對俄國十月革命進行了宣傳，中國共產主義者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在上海、北京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而在一九二

一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一些革命的劃時代的變革，對魯迅的思想上了很大的影響，他的“吶喊”，包括“阿Q正傳”在內，是遵循革命前驅者的命令作的，因此說“阿Q正傳”和“故鄉”是幻滅，是空虛，是看不見前途，這種論調絕對不能成立。

魯迅寫“阿Q正傳”的目的，第一是要徹底摧毀阿Q的投降主義，防止阿Q精神勝利的復活，不止是懲前，而是懲後——並且是二三十年之後。果然，在一九二三年，不過是兩年之後，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投降主義傾向就在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暴露出來了。——到蔣介石，就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那更不用提了。第二是要農民團結，要起來推倒“高牆”，要消除“隔膜”，反對“分離”，要“心心相印”，要消滅“等差”（雖然階級觀點還不是很明確）。一句話，要團結，要阿Q真正地站了起來，莫欺負王鶴、小D、小尼姑、吳媽，……因為要消除“隔膜”，才寫“隔膜”，要推倒“高牆”，才寫“高牆”，要消滅“精神勝利”，才寫精神勝利的慘敗和可恥。總之，要革命，才寫不革命，要鬥爭，才批判不鬥爭；並不是一來就寫打呀，殺呀，才是革命文學。第三，他反對偷生苟活，主張活動、戰鬥，他認為國民性是一定可以改變的，一定有復生的希望，只要阿Q不自誇為文明古國，只要別人不誣告阿Q，只要沒有假洋鬼子，那麼國家一定可以復生，他說：“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也可以有破例的復生的希望”。又說：“但這一點慰藉也會勾消在自詡古文明者流的筆上，淹死在許多誣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撲滅在許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動上”。

（“華蓋集”：“忽然想到（一至四）”）這是一九二五年二月寫的，也可以作為對“阿Q正傳”的一點解釋。他提出：“我們目下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部踏倒他。”（“華蓋集”：“忽然想到（五至六）”）這兩篇文章，是在“阿Q正傳”後三年寫的，固然比寫“阿Q正傳”時更進步更堅決，但基本精神是一樣的，即是反對偷安苟活，主張活動戰鬥，“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墳”：“燈下漫筆”）這是魯迅先生寫“阿Q正傳”的目的。

魯迅在“阿Q正傳”裏如何批判辛亥革命？

劉堯民

爲什麼“阿Q正傳”要插入辛亥革命的事件？

假如魯迅先生只想消極地反映地主階級剝削的罪惡和農民階級被剝削的痛苦，那麼“阿Q正傳”不插入革命後的幾段也够了。要知道，一篇偉大的現實主義的作品，不單是消極地反映現實，還要求積極地改造現實。我們讀着“阿Q正傳”，看見了地主階級這樣窮兇極惡的剝削和農民階級這樣慘酷絕倫的被剝削，在情感上就不能容忍地有一種解決的要求。於是乎作者便進一步地引導我們看要怎樣來解決？要用什麼方法來解決？像這樣解決對不對？所以插入辛亥革命的幾段，使我們體會不單有這種改造現實的要求，而且更指出改造現實的道路，當然，所謂藝術的改造現實，並不是每篇作品裏面都要插入一段革命的事件，是說偉大的現實主義的作品，使我們讀了下來都會引起一種強烈的和明確的明天的希望。魯迅先生的作品每篇都有這種情形。“狂人日記”的末尾提出“救救孩子”的一句話，便指示出後一代的希望的前途。“藥”裏的夏瑜墳上放了一個花圈便指示出將來的光明。“故鄉”的末尾談到“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也指示出將來的希望，更指示出希望的實現在結合羣衆的力量。“阿Q正傳”插入辛亥革命的幾段也是同樣暗示出明天的希望，而且是更明確。

“阿Q 正傳”不是歷史，它裏面沒有正面出現過一個革命黨，更沒有正面來寫出一段革命發展的事實。他却借着這個小小的農村和縣城的各階級和各階層的人物，從側面、從一角來反映歷史，把這一件巨大的歷史發展的整個過程和它的真實性寫的比當時一般的辛亥革命的歷史高出百倍。這不能不使人佩服魯迅先生的思想性之強，歷史觀察之正確，藝術性之卓越，他能够把這一革命事件從轟轟烈烈的先聲奪人的開始，一直寫到了低潮，寫到了失敗的結束。表現出三個階段的發展，兩個階級的矛盾。主要的是魯迅先生掌握了歷史的規律，以這一個小地方的兩個階級矛盾的發展，就把整個革命的發展過程指示得非常清楚。你看，他寫剝削階級開初對革命恐慌，繼而安定，繼而投機鑽空子，繼而借革命的力量來鎮壓農民。另一方面，被剝削階級的貧僱農始而對革命不認識，對革命害怕，繼而對革命感興趣，有了一種模糊的階級感，繼而想參加革命而沒有路道，繼而走錯了道路而碰了釘子，繼而消沉，最後被鎮壓。這樣把兩個階級的升沉、矛盾，通過三個階段的發展，便很清晰地把它台辛亥革命的歷史寫出，而且很雄辯地把它批判出來。我們不能不佩服魯迅先生的巨大的藝術才能！

第一階段，寫革命風聲初初傳來時，從城裏的舉人老爺，到未莊的趙太爺、兒子，以至於趙白眼都害怕起來，自自然然對阿Q 改變了態度。而阿Q 起初也害怕革命，恐怕是“與他爲難”，但從舉人老爺害怕革命的對面，才漸漸覺得革命對於自己是無害的，這表明阿Q 這樣的貧僱農在革命的威力之下開始了他的階級的覺悟；一面寫出在革命過程中的兩

個階級的心理的變化，同時也說明了革命（造反）是先天地注定了爲被壓迫階級服務的。現在在兩個階級間已經起了這些心理的變化，對於革命是非常有利的，也就指示給這一般革命的領導者就要如何來掌握這些有利的條件，而完成他的任務。

進一步我們又來看他分析剝削階層中的心理的變化：

趙府上的趙太爺，和他的兒子趙秀才，和趙府的兩個真本家趙司辰和趙白眼，站在大門口談論革命，阿Q走過來，他們的對話便開始了。魯迅先生用很簡單的幾句對話和極簡單的稱呼的字眼，便把各人的身分、年齡、心理刻劃的非常真實。他們父子兩個對阿Q的稱呼是兩樣，趙太爺稱阿Q爲“老Q”，趙秀才却叫他“阿Q”，在這稱呼的兩樣上，就深刻地表現出他們父子間因年齡的大小而有世故深淺的差別。趙太爺這個老奸巨猾的傢伙，世故是深沉極了。他在平常對阿Q的那種嚴厲的態度，到現在却變得這樣溫和親熱。他曉得現在阿Q的這一層人是“惹不得”的了，所以想竭力來安撫他，給他一個好臉嘴，希望他不要對自己報復。這個老世故，臨到重要關頭是這樣胆小，主要的是生恐他的身家性命受了危害。這是一個極狡猾的地主典型。

趙秀才是一個公子哥兒，他還沒有體會到環境的嚴重，到這個時候還拿不下他的臭架子，還叫阿Q爲“阿Q”，不及他老子的老練多了。

他父子的一深一淺，在前一階段向阿Q買東西的時候，對阿Q的看法就不同了。他們已經曉得阿Q的“來路不正”。秀才想吩咐地保把他驅逐出未莊去。“但趙太爺以爲不

然，說這也怕要結怨，況且做這路生意的大概是‘老鷹不吃窩下草’，本村倒不必担心的”，這樣世故，比他兒子老練得多了。在那時還怕“結怨”，況在這個嚴重的時機，他更不敢“結怨”而卑躬屈節的叫“老Q”了。

至於趙白眼，他是趙家的本家，出入趙家的狗腿子，曾經幫過兇，但到這時怎樣呢？他比趙太爺更進一步了：

“阿Q……Q哥！像我們這樣窮朋友是不要緊的……”

他到這時却要和阿Q做“窮朋友”了。這雖是對阿Q告饒討好，保全他的小身家，然而已明明看出，到了嚴重的時期，這一類人就很可能起分化作用了。這一階層的人，魯迅先生也曾把他們的心理分析過，即是“准風月談”裏的“二丑藝術”。

魯迅先生以最少的對話和最簡單的詞句把各人的性格、心理的狀態表現得這樣深刻清晰，這是承繼了中國古典文學如“水滸”、“儒林外史”的優秀傳統，而不是從外國文學中繼承來，更不是像資產階級的“心理小說”，爲分析而分析，無思想性，無目的性。而魯迅的分析心理的變化是結合階級內部的分化，是反映出第一階段中革命的風聲到來時的現實的情況，而且指示出這些階級心理的變化及剝削階級內部的心理的分化，對於革命是有利的條件，也就是對於革命抱着無限的希望，希望完成革命的偉大任務，解決農民問題。

到了第二階段，是革命的落潮時期，也許在當時的革命的領導者們認爲是革命的高潮，“革命已經成功”的階段。革命軍入了城，一切秩序都安定，所謂“吏民安堵”“七豎不驚”，仍然是一場改朝換代的把戲，並沒有別的。魯迅